



# 把一切献给厦大

—— 郑道传、陈兆璋教授伉俪赠书展



厦门大学图书馆  
XIAMEN UNIVERSITY LIBRARIES

# 目 录

一、郑道传/陈兆璋教授简介

二、讲义与卡片

三、书信奇葩

四、书刊撷英

五、《热血与坚忍》文献与书稿

六、纪念与缅怀

(1) 《飞腾在没有时空的天堂》（潘懋元）

(2) 《好导师郑道传》（张小金）

(3) 《一位被称为“先生”的女教授》（陈宜淳）

(4) 《我的导师陈兆璋教授》（王东良）

(5) 《写给我的父亲和母亲》（郑启平）

(6) 《王亚南的赠书》（郑启五）

(7) 《陈兆璋老师的亲笔信》（郑启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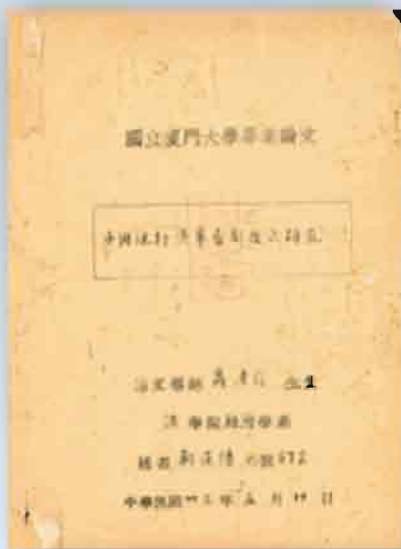


## 一、郑道传、陈兆璋教授简介



郑道传1944年毕业照

郑道传(1919.4.21-2002.4.27)男,湖南衡阳人。194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曾任厦门大学图书馆馆员、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51年随恩师王亚南重返厦大,任经济系副系主任等,1957年被打成右派,历尽坎坷,双目失明,1979年重新复出,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民盟厦门市委顾问,曾多次参加全国及国际学术会议,获“全国自强模范”称号,著有《殖民地问题》(中华书局1948年出版)、《〈资本论〉方法论研究》(厦大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部分文章被收入《热血与坚忍——郑道传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出版)。



本馆珍藏郑道传1944年毕业论文



陈兆璋1946年毕业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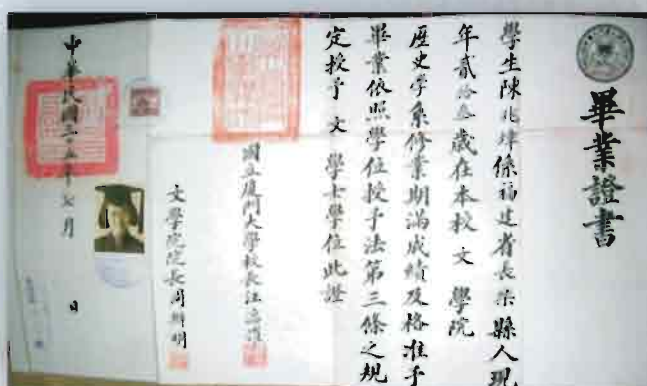
陈兆璋（1923.9.6—2010.5.22）女，福建长乐人。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后曾在福州一中、厦门一中等学校任教，1953年到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生致力于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先后开设“世界中世纪史”、“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等各类课程十门，参加国家教委组织的全国高校通用教材《世界史·中世纪史》的编写与统稿；发表有关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系列论文，曾获1988年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8年曾应邀任厦门大学“海关史”及“中国近代经济史”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1989年至1996年先后应邀为复旦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评议博士学位论文七篇；曾多次参加全国及国际学术会议。著有《世界中世纪史散论》（厦大出版社2003年出版）。



本馆珍藏陈兆璋1946年毕业论文

## 二、讲义与卡片

陈兆璋教授一生制作的教学科研卡片，数量多达七千多张，后学可以从中感受老一辈知识分子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手书时代”的学术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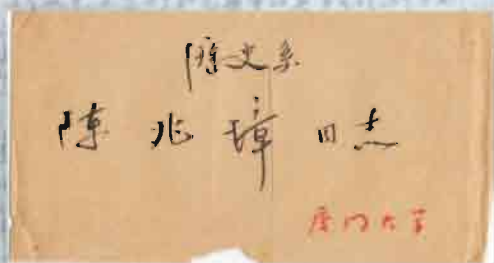
陈兆璋1946年的毕业证书（汪德耀校长签发）



王亚南校长给陈兆璋的聘任书（1956年）



王亚南校长给陈兆璋的系务委员的聘任通知



校长办公室给陈兆璋的聘任书信封（何励生先生手书）

### 三、书信奇葩

郑道传教授、陈兆璋教授生前珍藏的旧信数百封，其中不乏谢希德、施蛰存、谷齐光、叶国庆、姚一苇、王梦鸥等著名教授学者的亲笔信札和明信片，特别是美国佛吉尼亚大学朱一雄教授、庄昭顺作家伉俪、首都师范大学戚国淦、寿纪瑜教授伉俪的亲笔信札多达近百封。这些信札无论是文字的精典、思维的闪光还是书写的娟秀都令后人仰慕，信札的时间多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不仅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奋发的思想与奉献的情感，还体现了民国时期的老学子儒雅的风范，体现了厦大长汀时期的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同学情、师生情和母校情，封封真迹都烙上着深深的时代印记，是极为珍贵的文字史料。（配图十幅）



万鸿开教授贺年片



施蛰存教授贺年片



施蛰存教授贺年片





张圣才先生实寄封



戚国淦教授实寄封



黄开禄教授实寄封



吴厚沂、陈梅卿校友实寄封



朱一雄、庄昭顺校友实寄封



## 四、书刊撷英

郑道传教授和陈兆璋教授的赠书包括他们的著作《殖民地问题》（中华书局）、《世界中世纪史散论》、《资本论方法论研究》等，以及他们参与编写的著译《世界中古史》、《特伦甘那人民的斗争及其教训》等，还有经济学、历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文丛上千册，其中还不乏著译名家的签名本，很多图书的内页注满了图书的主人在阅读和备课时留下的密密的眉批和重点划线。赠书中还包括《世界知识》、《外国史研究》等成套杂志，填补了学校图书馆馆藏的缺漏。

郑道传教授专著



陈兆璋教授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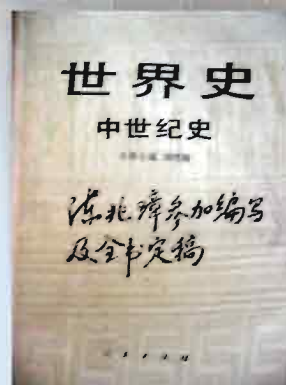
王亚南早年的论著



1955年的《世界知识》合订本



陈兆璋参与编写的  
教育部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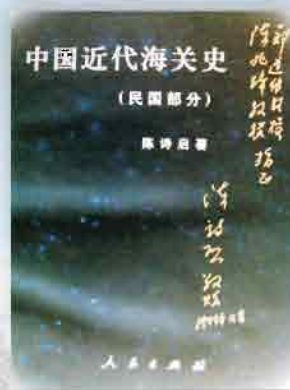


历史的内部读物





名作珍稀版本



签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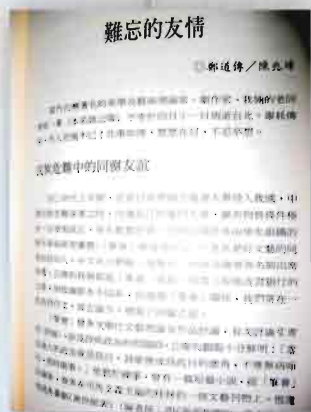
签赠本



签名本2



重要的紀念文集



台灣文集選本



中華書局的老書

## 五、《热血与坚忍》文献与书稿

郑道传教授跟随恩师王亚南教授来厦大任教，生前曾任厦大经济系副系主任等，1957年被错划右派，后双目失明，但他自强不息，在黑暗中奋起，获“全国自强模范”称号，《热血与坚忍》一书是2006年为专门纪念这位坚忍的“盲教授”而出版的一部大型文集，其中有潘懋元教授、陈可焜教授、陈孔立教授等二十余位校内外教授学者分别亲笔撰写的文稿，以及新中国初期王亚南校长在两年里颁发给郑道传的六张聘任。



两年里王亚南给郑道传开了六张聘书



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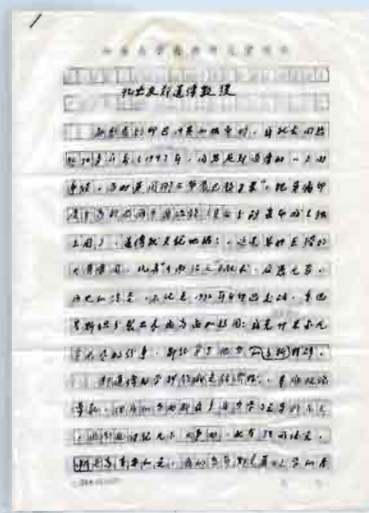
聘书



王亚南（中排右三）和郑道传（中排右一）的合影



陈可焜教授手稿



潘懋元教授手稿



郑道传教授纪念文集

## 六、纪念与缅怀

### (1) 飞腾在没有时空的天堂

——忆老友郑道传教授

潘懋元

每当看到印巴冲突的报导时，我就会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1947年）同老友郑道传的一席时事谈。当时英国刚公布“蒙巴顿方案”，把英属印度分为印巴两个自治领（其后分别宣布成立独立国），道传就尖锐地指出，这是老奸巨猾的大英帝国玩弄“分而治之”的权术，后患无穷。历史的演变，不论是1972年印巴交战，东巴基斯坦分裂出来成为孟加拉国；或克什米尔无穷无尽的纷争，都证实了他当年分析的精辟。

郑道传的学科领域是经济理论，并非政论专家，但我们当时都或多或少学了马列主义，因而在讨论天下大事时，就有了共同语言。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当年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文学，才使我们两个专业不同的同学建立了长久的友情。

郑道传是1944级经济系学生，我虽辅修经济，而主修却是1945级教育系，年级尚低，科类不同，能够走在一起，日夕过从，就是以文学为媒介。厦大当时一些爱好文学艺术的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诗与木刻社”，前后参加活动的约20人，经常活动的有写小说的姚公伟（一苇）、写诗的勒公珍（公丁）、译诗的朱遵柱（伯石）、搞木刻的吴忠翰和朱鸣冈、绘画的陈起典和朱一雄，还有姚慈心、范筱兰、王茂毓（缪雨）等等。郑道传和我主要是写文艺理论，他也喜欢写小品文，我则偶尔写小说，还喜欢朗诵诗。文学家施蛰存教授、诗人虞愚教授也偶或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个小集体随着成员陆续毕业而消失。但其中好几位后来成为知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道传和我则各自专心于自己的专业，文学只能是业余的爱好，所不同者，道传的文学爱好后继有人。

郑道传毕业后，留校工作一段时间，到泉州海疆专科学校教书。解放后，又被王亚南校长聘回厦大任教，在经济学、哲学上都有很有造诣。可惜中年之后，视力急剧下降，不能看书只凭听诵默记，从经济系到哲学系，从校内到校外，讲课做报告，就凭记忆侃侃而谈，旁征博引，条理清晰，深受学生欢迎，并以其学术成就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这不仅得力于他的学术功底与超常智慧，更有赖于他的坚强意志与过人毅力。在他离开人世之前，我曾在病榻前同他一起，回忆往事，纵谈时事，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他的眼睛已看不见光彩绚烂的世界，但我深知他的心里是亮堂的，心情是朗爽的。正是怀着一颗亮堂朗爽的心，他无怨无悔地离开人间，飞腾没有时空的天堂。

2002.12.1



厦大同学郑道传（前左三）陈兆璋（后左三）潘懋元（后左六）1944合影



## (2) 好导师郑道传

哲学系81级研究生张小金


2002年4月27日清晨，我和太太赶到厦大医院与我的导师郑道传先生告别。几个小时之前，83岁高龄的先生辞世了。记得是几个月前，我去看一直受着中风困扰的他。当我抚摩他的手时，他眼中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流。一个失明几十年的老人，此时更加上失语，可心里却比什么都明白，这是怎样一种煎熬啊。我告诉他，你不要急，我能懂你的心思。如今望着先生平静的面容，我们心里默默祷告，先生此去天堂一路走好。

我与郑先生结师生缘是在1982年春天，我刚来厦大的时候。我本来考的是自然辩证法专业，却因为“政审失误”（《中国青年报》用语）延迟一年半入学并转到哲学系。头一件大事就是选择导师。那一届七个学生，其中有一人要分给郑先生带。分管研究生的系领导赵民老师对我们说：王亚南有两个“高足”，一位已经移居香港，另外一位就是郑先生。又说，郑先生生性耿直，57年打成右派，吃了20多年苦，现在已经平反。由于长期受迫害，他的眼睛坏了，视力很差。赵老师与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属于那种一见面就让我信任的类型。他的描述虽然简单，但把郑先生最重要的特点点明了：德才兼备，经历坎坷，身有残疾。

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为此专门上门去拜访郑先生。在短暂的接触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慈祥、乐观、直率；记忆力很好，对《资本论》很熟悉。是学者型而不是官僚型的教授。回来后有人议论说，他眼睛失明几十年，脱离学术太久又难以接受新东西。还有人考虑了其他问题，最重要的有关个人今后发展的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实际问题。我所犹豫的，则主要是想继续我所喜欢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赵民老师开导我说，于光远既是《资本论》的专家又是自然辩证法的专家，这说明两者不矛盾。我于是同意了。之后，我单独去见一次郑先生。他谈到他的坎坷经历。我也告诉他，文革中我历经磨难，考研究生也被人诬告后向胡耀邦告状才被补充录取。他后来和别人开玩笑说，我招了一个研究生，也是七灾八难，与我同病相连。

我读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向是《资本论》方法研究。自然，《资本论》是必修课。郑先生亲自给我讲了《资本论》的概要。还给我讲了他所接触和了解的《资本论》译者郭大力和王亚南的情况。考虑到《资本论》的基础和重要性，他又安排我去听经济学院《资本论》的课。当时教育部在厦大办了全国高校教师《资本论》进修班。我用三个学期听完这个班的全部课程，把《资本论》三卷过了一遍。我听课后再将这个班的信息不断地告诉他并向他请教。这一年半，先生在与我的讨论中几乎温习了一遍《资本论》。

郑先生告诉我，要研究《资本论》的方法，必须深入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他几乎一字不漏地引用列宁的话：“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



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郑先生不仅要求我通读黑格尔的《小逻辑》，而且经常让我给他讲黑格尔逻辑学的内容。当时出的几本黑格尔专家写的书，他也让我挑些部分念给他听。此外，那几年我们系里从外面请来的黑格尔专家讲课，本来对象是本科生，但他每次总是让人扶着去听课，一丝不苟。以致赵民老师感叹地说，在所有的听课人当中，郑先生是最认真最让人感动的。讲课的专家本身也每每被感动。郑先生自己则笑着说“我要补黑格尔的课”，我是在“脱毛”（恩格斯语）。先生能够记得不少黑格尔的原话。他在讲课、会议发言中常常恰到好处地引用黑格尔的哲理名言，每每使听者佩服不已。

早在研究生一年级，郑先生就开始指导我作研究。他虽然眼睛不好，却能准确地抓住学术热点和前沿。他告诉我，苏联的学者对马克思著作特别是《资本论》中的系统思想有研究。这既是学术上的前沿，也与我对科技哲学的爱好吻合。我按先生的指教，将当时主要的文献通读，并且把主要信息反馈给先生。又按照先生的嘱咐，翻译了当时日本学者的若干著述，与日本的《资本论》专家通信，并把信息经常反馈给郑先生。

郑先生眼睛不好，但是耳朵和记忆力却超过旁人。以耳闻补目睹，是先生的特点。他每天听广播，把重要信息都记下来。有天他告诉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播放我写的一封信。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播放自然辩证法系列讲座。我写信纠正其中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错误。使我意外的是，仅仅听过一遍广播，先生不仅能讲出我的信的内容，连细节都没错过。我真惊讶一个失明老人的记忆力。

郑先生对学生既有高要求，同时也很尊重学生自己的思考。我作论文前，先生要求我查阅和通读国内找得到的几乎所有文献，尽可能地查找日本和前苏联的文献。为了能够到东北和北京等地查找文献和寻求名家指导，他不顾盲人的困难亲自去找当时的有关校领导要求批给我旅差费。我的毕业论文，从选题到研究和写作，郑先生都很尊重我的想法。我每写好一章后，就把全部内容录制成录音带。先生把每盒录音带听了一遍又一遍，有的几乎都能背下来。他在认真地听完论文初稿又仔细思考后，才提出修改的意见与我商量。有时，他也会用铅笔亲笔写下修改的意见。他先将16开的白纸对折若干次然后展开，用左手指摸着纸的折痕，右手执铅笔抵着左手，就能沿着纸痕写下基本平整清晰的字体来。当我读着一个失明的老人这样艰难地写下的认真的意见，不能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郑先生特别强调要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来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我国的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的许多人没有真正读过《资本论》。而马克思虽然曾经有过撰写唯物辩证法著作的想法，终因忙于《资本论》的写作而未能付诸实现。郑先生对我多次谈到列宁的重要观点：“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



前的问题”。他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如果不读《资本论》，就不可能搞好搞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他鼓励我从《资本论》出发去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作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同时，从上述列宁的指示出发，他也很强调要运用《资本论》的辩证法来研究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他对我说，要搞社会主义的《资本论》，要搞改革开放的逻辑。我记得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搞活的辩证法”。我毕业之后的十几年，一直按照先生的教诲在作。除了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著作之外，还写作了多部运用《资本论》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著作。每次我把出版的新著送给郑先生时，他总是高兴得如同自己出了书一样。当我遇到困难或者遭到个别人非议的时候，郑先生总是鼓励我：搞活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沿着《资本论》辩证法的路走没有错。眼光要放长远一点。这是先生对我在学术方向上非常宝贵的指导和鼓励。

1985年冬天，全国《资本论》学术研讨会议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郑先生很想去。由于眼睛失明，他已经多年没有外出过。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毫无疑问，必须有人陪同照顾，他才能赴会。我那时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集体宿舍。他亲自做另一个也要外出开会的研究生的工作，让他放弃机会留在厦大帮我照顾几天孩子，我就扶着先生上路了。按当时文件的规定，郑先生坐软卧，而我只能坐硬座。白天我可以在软卧车厢照顾他，晚上只好将先生交给车厢的服务员。为了避免座位被别人“永久占领”，即使白天我也要不断地回到硬座车厢。到了开会的旅店，先生可以住3人一间的，而我只能住6个人间的。这样，照顾起来总是很不方便。先生行动须有人搀扶，但他为了减少我的不便，总是自己尽可能地自力更生。有时我还没有赶到他的客房，他就被同屋的教授搀扶着去了会场。先生很珍惜这机会，在小组会和大会上都积极发言，受到普遍的好评，他的发言也每每登上会议的简报。

会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请先生去讲课，而我却很想借机会去旅游一两天。但一个失明的老人如何放心让他单独旅行呢。郑先生知道我的想法后说，你放心去吧。他笑笑说，你可以把我“托运”到南京去。我一买到车票就给南京拍去电报，告诉郑先生坐的车次、车厢，让他们派人直接到车厢来接。那天深夜，在郑州的刺骨的寒风中，我把郑先生送到软卧车厢安顿好，找到车厢服务员。告诉她，这是一个失明的教授。请多加关照。我在西安旅游两天后赶到南京时，郑先生已经讲课完毕。那天，在部队首长的宴会上，他笑着说，我这次被“托运”很成功，很安全。政治学院的滕部长说，郑先生课讲得很好，大家都佩服，很受教育。著名哲学家萧焜焘教授也对郑先生的讲课大为夸赞。

郑先生不仅在学术方面关心我，而且关心我的生活。1984年冬天，我急性阑尾炎开刀，郑先生在夫人的搀扶下到医院来探我。我毕业留校后，郑先生亲自奔走，找小学校的领导，解决我的儿子在没有厦门户口时的读书问题；又多方奔走，找有关领导请求，希望解决我的夫妻分居问题。在我看来，好的研究生导师有三类。一



类是重视学生学术方面的培养；一类是进一步关心学生的人品和大德；一类是在生活上问寒问暖。郑先生是三者兼备，是难得的好导师。连我的一些研究生同学们也感觉到，郑先生不仅是导师，也是兄长和朋友。

郑先生的夫人陈兆璋教授，是一位研究世界中世纪史的专家。有一次我在他家看到照片，才知道陈老师与当过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教授是厦大1946届的同室好友。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完美的女性，一位高雅的知识女性，又是一位贤妻良母。郑先生虽然一生坎坷，但他有陈老师共度此生，毕竟有福。

郑先生在厦大读本科时念的是经济，但对文学也爱好，副修中文，课余也参加文学社团活动。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谈起他年轻时的好朋友姚一苇，我那时无知，并不知道姚先生。郑先生摸索着在纸上写下“姚一苇”三个字，他说，你的老乡啊，南昌人，在吉安读中学，然后考取厦大。一苇在厦大也是读经济，后来在台湾搞戏剧，很有成就的。几十年没有音讯，最近来信了，要来大陆看我。提起姚先生，郑先生不禁感慨历史和人生。前几天我听到连战先生在厦大接受荣誉法学博士时的讲演，连先生几次提到姚一苇，并且引用姚的诗句，我又不禁想起郑先生当时追怀青春时的复杂面容，也想起我的这位已故的老乡兼校友来。

可以说，郑先生是一个才子，有多方面的才能，口才文笔都不错，1949年前就有专著出版，1957年前他又有书稿杀青并通过出版社审稿，可惜来不及问世。我想，他一生的遗憾是，在他最年富力强的二十年里，他没有机会为国家和社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我很替他惋惜，这是一代人的悲剧性命运，无论如何，总算是盼到了冤案平反的日子，晚年奋起而有所作为，不幸中之万幸吧。



郑道传教授、陈兆璋教授和他们的老同学姚一苇（中）在一起



### (3) 一位被称为“先生”的女教授

——怀念我的导师陈兆璋

陈宜淳（历史系83级）

前些时候，在苏州出差的我突然看到师兄王东良来电，还没接听，我就预感是关于导师的不好消息，果然是先生走了的噩耗。心里难过、悲痛，对先生的回忆一幕幕出现在脑海里。

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被老师、同学称为“先生”的教授就是四个人，即：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傅衣凌傅先生，隋唐史的韩国磐韩先生，海关史的陈诗启陈先生，世界中世纪史的陈兆璋陈先生。导师能够和其他三大教授一并被尊称为“先生”，与她一流的教学科研和一流的道德人品有很大关系。系里许多有名的教授，如孔永松、杨国桢、郑学檬、陈支平、杨际平、陈明光、施伟青等在我们这些学生面前，也都是这样称呼她的。听过兆璋先生课的人，无不称道先生的上课质量；和先生有过接触交往的人，无不敬重先生的人格；了解先生家庭遭遇的人，无不钦佩先生的坚强。

先生家庭的遭遇源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连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政治运动。先生的爱人郑道传教授被政治运动无情袭击长时间迫害而双目失明，在种种压力下，先生始终不离不弃，给了丈夫人间最温暖的爱。几次读郑教授的纪念文集《热血与坚忍》，每每都要落泪，为郑教授的遭遇更为先生的坚强。郑教授何其不幸，陈先生何其不易！有了陈先生，不幸的郑教授又何等有幸！郑教授只要和我们一讲起陈先生，这位盲教授的眼里就噙满泪花；而只要陈先生在说话，这位潇湘汉子总是温柔得像绵羊在一旁微笑、专注地倾听着。郑教授对陈先生一直心怀愧疚，多次和我说起，陈先生为他付出太多，没有他的拖累，她早就可以评上教授。为郑教授所做的一切，陈先生从未吐露半个字，也从没有半点抱怨。

郑教授落难时，大儿子启平就七八岁，小儿子启五不过四五岁。羸弱多病的先生成为整个家的精神支柱，她要每日每夜给被批斗被劳教的丈夫以生的希望，还要为被歧视被欺负的儿子撑起一片蓝天。两个儿子都特别有志气、有出息。大儿子从一名打铁匠硬是把自己打造成优秀的中学语文老师。小儿子启五初一未念完就被迫辍学，恢复高考第一年由一个食堂伙夫一举考取厦门大学外语系，如今已是非常活跃的作家。每每和我谈起两个儿子，先生总是既骄傲又平静。先生总说，两个儿子、两个媳妇、两个孙子性格迥然不同，很有意思。说启平更稳健，让她更放心些。启平、启五都是真正的男子汉，粗心的时候肯定是有，先生对两个儿子是了解也是理解的。先生说大媳妇性格文静，工作认真细致，称得上工作上的行家里手，完全凭本事一步一个脚印从一般员工使自己成长成为著名国企的中层领导；二媳妇性格外向开朗，也是一名很优秀的教师；大孙子望先学习自觉，有上进心，学习上从不要操心。先生从心里是很希望望先继续读研究生的，在先生这样的老夫子看来，没有什么比读书更好的了。先生说，小孙子望宁活泼可爱、贪玩、兴趣广泛，先生还说，启五一家子就住在附近……和我说这事的时候，望宁不过六、七岁，现在望宁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了。先生讲话的神情和语气可见她是极爱两个孙子的。说起这些，先生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特有的幸福的微笑，先生的微笑是那么的从容，那么的完美。先生的坚强和爱挽救家庭于崩溃边缘，更迎来了劫后余生的完美和幸福。张小金教授说先生是完美的女性，我有同感。先生正直谦和，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对那些玩弄权术者、对那些糟蹋学术者、对那些亵渎讲台者，先生是发自内心的厌恶，但从未见先生说三道四，有人在先生面前说起这些，先生历来是沉默，只是听。对绝大多数同行、同事、朋友，先生是发出内心的尊重，她经常跟我讲起全国各地这个或那个同行学问做得如何如何好，在哪一些方面有什么独到见解。对省内同行，她多次跟我提起福建师范大学的谢天冰教授，说谢老师的论文很有功力。对系里的傅衣凌先生、韩国磐先生、陈诗启先生，先生在任何时候对他们都充满敬意。就是对系里许多年轻教师，先生也都很尊重，说他们年富力强、年轻有为、很有前途，言语中总是真诚的赞赏。

先生治学严谨是出了名的。她轻易不写文章，从来只问质量不求数量，写论文一定是研读了大量资料、专著、论文的基础上的有感而发，每一篇必定有新观点、新见解。先生的论文有理有据，丝丝入扣，从不牵强附会，从不妄下结论。先生学生时代就是厦大文学社的活跃分子，有很强的文字功底，文字干净有力量，加上逻辑思维能力好，每一篇论文都很有分量，读起来总是耐人寻味。先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写的第一篇论文，即引起学术界注意，戚佑烈教授在述评新中国成立15周年来世界中世纪史学的教学与科研情况时，将该文列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关于先生在世界中世纪史特别在英国史、西欧封建经济史领域的学术地位，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领域泰斗-----中国世界中世纪研究会理事长戚国淦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最能体现先生研究功力、研究水平的是《英国封建社会的完备性和不完备性与资本主义起飞》和《论中世纪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两篇论文。据戚先生回忆：《起飞》一文尚未发表，作者仅在1982年北戴河中国英国史学术讨论会上口头表达自己的看法，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光明日报》史学动态专栏和《世界历史》杂志都加以报道，《中国历史年鉴》还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两年后，在南京举行的英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该文的论点又引起英、美学者的重视和关注。至于《过渡》一文，戚先生认为，该文表明作者“已走上了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水平”。先生长期在世界中世纪史领域耕作很是不易，国内这方面研究起步较晚不说，厦大基本上就是她一人孤军作战，学校图书馆有关这方面的藏书寥寥无几。以前学校外汇比较紧张，从国外买这些书不易，先生为了添置一些专业外文参考书，与图书馆的王小牧老师作了沟通争取，我在研究生期间读的一些外文专业书大多是先生沟通争取来的。为这事，先生多次在我面前表示对王小牧老师的感激之情。凭先生的实力她本来一定会有一本很有分量的著作问世的，不仅我这么看，好一些先生的学生也都向我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先生这个领域要出一部专著极困难的事，先生自身要求又高，加上晚年身体及眼睛不济，虽然先生奋力冲刺，也难免力不从心。像先生这样有强烈事业心、使命感的学者，在她内心深处是多想倾力为后人留下一份厚重的礼物，这是先生从未说出口的遗憾！我们也为她感到遗憾！其实，先生不必遗憾，先生的那些论文在学术界永远都占有一席之地的。



先生对三尺讲台一生怀着敬畏之心。先生常说，教师讲课是一门艺术，要上好课很不容易，教师做出十分的努力，也只会得到八分的收获。先生是不会满足于八分收获的，她要付出的一定是十二分的努力。先生对上课的内容早已烂熟于心、倒背如流，但每次上课包括给本科生上课都要精心准备一番，都要把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吸收进讲义，她要把最精彩的留在三尺讲台，把最好的东西传送给学生。大三时，先生给我们班同学开了《西欧封建经济史》选修课，不少同学慕名选了先生的课，有蔡佳伍、李小平、刘恩国、汤宁、王德弟等大十几个同学，同学对先生的课交口称赞。记得他们讲，这个老太太不得了，讲课有理有据，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没有半句废话。除了夸先生课好，同学还夸先生人品好。特别是河北的刘恩国，毕业后每次给我挂电话总要问起先生的情况，同学聚会时还和我一起登门拜访了先生。我当时就很后悔没有选修先生的课。后来没有选修过先生课的我毅然决然冒险报考了先生的研究生。读了先生的研究生（1987-1990年），才真正感受到先生授课的与众不同，先生的课是质量很高的启发式教学。这种教学对“教”与“学”的要求非常高，学生要深度预习，深入思考，带着问题、带着见解在课堂上先行讨论。上这样的课，老师要有很强的驾驭能力，这种驾驭能力既要有深厚的研究功力作后盾，又要有课堂上很好的讲课艺术和综合能力。当时，上课地点是在先生家的客厅，几个到厦大进修的老师也都慕名选了先生的课，有重庆的郎维达、福州的郑翔、山东的黄娟，每次课大家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最后先生总能给大家心服口服的精到讲解。参加工作后包括前不久，我参加一些学习培训，有的老师也采取了20多年前先生采用的这种启发式授课方式，但是效果总不是太好，往往是学生讲开后，老师不能很好地收场。所以，如果老师功力不够、责任心不强，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是难有什么效果的。我经常听一些老师一味责怪现在的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如何不好，这个时候我都会从心里暗自问他们：你们上课上得怎么样呢？你课上得不好有什么理由让学生表现好呢！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先生，想起先生当年上课的情景。先生晚年身体不好，视力极差，每一堂精彩的课的背后，都是先生艰辛的付出。先生当了一辈子教书匠，从来就是认认真真备好每一次课，认认真真上好每一次课，每次上课都像上战场一样，她用一生的付出诠释了师道尊严，赢得所有学生的尊重。

先生带研究生可谓用心良苦。她总是想尽办法让我们在三年里多学一点东西，除了善于创新课堂的教学方式，善于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效果，还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对学生研究成果的推荐更是不遗余力。她总是要求我们要以批判的精神学习，以专业的精神搞研究，以钻研的精神做学问。先生不喜欢标新立异，反对人云亦云，对“剪刀加浆糊”更是深恶痛绝。研究生一年级时，我写出了一篇质量较高的学期作业，先生高兴、欣慰之余，几次拿着文章亲自到图书馆阅览室一一核对外文资料引文是否准确，一一推敲论文的论点能不能站得住脚，这都是我亲眼所见。在先生的鼓励下，这篇作业后来做成了我的毕业论文，在先生的推荐下，论文后来发表在《世界中世纪史新探》论文集。先生的这种做事风格不仅影响着我三年研究生期间的学习生活，还深深影响着我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工作态度，

尽管我做不到先生那么严谨，但做事都还能秉承认真负责的态度，这与先生的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先生还时不时以自己的言行教育引导我如何做人，在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里没有虚伪、虚假、虚荣，只有正直、正义、正气。走向社会后，我一直都铭记着先生的教导，堂堂正正做事，明明白白做人。

先生与我母亲同岁，对我们这些学生视如家人，我谈恋爱成家以及生子，先生都在默默关注着。我带妻儿去看她老人家时，她是那么的高兴。虽然福州与厦门距离不远，毕业后我去厦门的机会并不多，20年里也就见过先生几次，平时就让留校的同学李小平代为看望。后来先生搬到市区住，小平和她也联系不上。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时，先生已经病重得无法认人了。晚年先生身体每况愈下，我是有感觉的，可到了先生完全认不出我的时候，我抚摸着先生的手心里满是愧疚。对父母要及时行孝，对老师又何尝不是？！先生走了，留给我的是永远的愧疚永远的遗憾！

先生毕业于福州一中又曾任教于福州一中，是当时福州一中最好的学生和最好的年轻教师。我现在住的地方和旧的福州一中校址（现为一中初中部）仅一墙之隔，周末及晚饭后经常在校园里散步，心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先生，想象着先生年轻时在一中学习和工作时的样子。先生文集中有一张大学毕业照，照片上的先生看上去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得意、那么的睿智、那么的大气，坎坷命运沧桑经历褪去的只是先生美丽的容颜，却永远洗不掉先生那颗美丽、纯洁、善良和勇敢坚强的心。

在我的心中，先生永远是最美好的、最温暖的回忆。



郑道传和陈兆璋教授和他们的研究生在一起




#### (4) 我的导师陈兆璋教授

王东良(历史82级)

2010年5月23日早晨，还在睡眠中的我接到电话，我的导师、厦门大学历史系陈兆璋教授因病于5月22日凌晨不幸去世。说真的，那时的我尽管思想上也有一些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我还是无法接受这无法逆转的严峻的事实。待我急忙赶到导师家时，家里所显示的一切好像并无发生此事似的。启平老师（导师长子）纵然悲痛，却以极其平静的口气告诉我“按照母亲临终留言，丧事一切从简，所以母亲遗体已于昨日送往火化”，听到这最后一句话，我真是无言以对，潸然泪下，只能面对着导师的遗像鞠躬致哀，我深为看不到导师最后一眼，不能送她最后一程而遗憾，也为她临终选择这一离开方式而敬仰。

导师之于我，抑或她的一家之于我，其学识之传授，人生之关怀，家风之沐浴，当是说不完道不尽的。我于1982年秋季从浙江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大一下学期，导师担任了我们的世界中世纪史任课老师，因为上的是大班（全班同学60人）通史课，我对当时留下的印象并不特别深，依稀记得导师那时已是华发初上，一副典型的中国高校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岁月遮不住人生的沧桑，也难怪那时导师已是一位60周岁的老人了，不过最可喜的，她是给我们上课的第一位厦大教授老师，听高年级同学私下议论，导师学问严谨，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严格，于是，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对她产生了一种“怕”的心态，深怕期末考考不过似的。说真的，那学期导师的课程期末考高分确实很少，我只得了81分。

转眼到了大三学年，按照学校课程设计，我们进入了选修课阶段，出于对世界史的多一点兴趣，更因夹杂着对导师的选修课报名人数少，大概可以得到更多受教机会的“私心杂念”，我选择了导师的“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课程。平心而论，在当时导师开设这样一门课程是具有挑战性的，这不仅仅因为我国史学界注重对本国史的研究，而对外国史特别是外国的上古史，中世纪史研究少人问津，而且国外史学界对世界史的许多重大问题争论颇多，学校图书馆、系资料室收藏资料也匮乏，所以，导师在开讲的第一堂课中开宗明义强调，这是一门探索性的专门史选修课，以期引发我们的兴趣和探索思考。在教学过程中，导师采取的不单纯是灌输形式，而是一种引导式、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方式，力求我们掌握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为此，她抓了三项工作，一是抓我们的自学能力，包括课前预习，阅读参考书及收集资料的能力；二是抓“讲”与“写”的能力，通过课堂讨论和布置作业等形式提高水平；三是抓专业外语能力，通过印发中、英文对照参考资料，开拓史学眼界，与此同时，导师也不忘介绍国内外史学界对本专题重大问题的最新学术研究动态，包括她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从中我们领略到导师不仅学识渊博，专业功底深厚，是当时国内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专家，用首都师大历史系戚国淦教授的话说“已走上了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水平”。例如，她于1982年撰写的《英国封建制度的完备性、不完备性与资本主义的起飞》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光明日报》史学动态专栏和《世界历史》杂志都加以报道，《中国历史学年鉴》也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该文论点还引起了参加我国



英国史学术讨论会精英，美学者的重视和关注。类似这样的论文，导师撰写了数十篇，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世，多在国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多在历次的相关学术会议上交流，也多被《中国历史学年鉴》这样的权威工具出转载介绍。2003年，导师应有关方面和同行的期待，将从教的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结集，编成《世界中世纪史散论》一书，由厦门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洋洋数十万字的文集，印证了一个世界中世纪史学者严谨治学的心血结晶，当然这是后话。一个学期一门选修课在四年的大学学习中也许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日后报考导师的研究生，不能不说与这一学期的选修和初步系统的学习，是一个最好的铺垫。

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缘于报考导师的研究生，我自然而然选择了导师作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在我成为导师的研究生前夕，有这么一段姑且也称作是学前培训的机会，亦称得上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儿。

大学毕业当年，我如愿以偿考取了导师的“中外封建经济史”方向研究生，这是导师第一次招收培养研究生，我也因此成为她麾下的第一位开门弟子。因为是第一次，又是我一人，导师以极其认真而严谨的态度带我度过了三年的求学生涯，除了大课外，我的大部分上课是在她家的客厅里上的。所谓的“上课”，授课也并不是主要的，更多的是采取交流、探讨、启发式教育，帮助我掌握研究式学习的方法技巧。这当中，生活上的关心也是印象至深的，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做一点回顾。

一是严谨的教风。在系里，导师的严谨作风在学生中是出了名的，这归因于她抗战时期母校厦大迁居长汀办学时的国难教育，归因于她对祖国民族强大的爱，对发展教育事业的爱，对培养合格学生的爱。我清晰记得她对我上的第一堂课中，详细勾勒了三年的学习计划，强调在三点学习方法上要齐头并进，第一是要通读马恩列斯经典原著，连《毛泽东选集》四卷也不例外，特别是论封建社会的经典论著、章节、观点更要精读，务求掌握背景、内容、本质甚至后人的评述。虽然马恩列斯著作文章版多量大，而且不少论述是需要反复阅读才能真正明了的，但通过泛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法，切切实实为我后面的研习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第二是要强化英语功底，辅修俄语。我的研究方向名为“中外封建经济史”，实质上研究的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西欧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史，熟读收集国外史学家的原版英文史料是必不可少的。曾听国内同行教授谈起，1984年，导师参加南京英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用极其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与国外同行交流论文，堪为美谈。只可惜我没有这个机会遇上，三年读研的日子里也无缘见到这样的风采。辅修俄语也是导师根据学科研究方向的需要为我设计的，一是俄文版的史料在国内相对多见，二是国内史学家比较认同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总而言之，在导师的严格要求下，我的英语阅读水平似有明显的提高，大抵也能看懂英文版古文了，俄语则能阅读一般文章。

二是探索精神。相对于本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世界封建社会许多重大问题是我国史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需要大力开展探索。导师经常倡导鼓励，做研究不要因循守旧，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敢于突破。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根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一文观点，认为英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是“完备的”，但她根据史料分析，得出英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既有其“完

备”的一面，又有其“不完备的”一面，两方面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这一结论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极大反响和重视。她还竭力倡导要用中外比较的方法，努力探究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发轫于西欧地区，并得到较好的发展，应当从各自更早的封建社会形态内部结构中去寻求答案，想来这也确实是一种扩宽思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受此启发，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就是通过分析英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发展变化作为切入点，揭示了中世纪英国农村中雇工关系的出现和农民阶级内部分化趋势的加剧，促进了日后英国资本主义因素较早萌芽的结论。

三是慈母般的情怀。导师在大部分学生的印象里是一位严师，但接触久了，了解多了，你定会觉得她有一颗慈母的心。她对学生，同事，家庭倾注的都是世间最珍贵无私的慈母的情怀，这里不能不述说她一生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丈夫郑道传先生。郑道传先生原是厦大哲学教授，满腹经纶，由于个性耿直，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被戴上右派帽子，被剥夺工作权利，两度被关进“牛棚”改造，乃至被折磨得双目失明，然而厄运并没有压垮他，困境并没有动摇他，特殊的经历铸就了他更坚强的意志。平反复出后仍坚持登台讲课，带研究生。作为妻子的导师，其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她无怨无悔，悉心照顾郑先生。我曾几次目睹了导师在家中照顾郑先生的细心，除了生活方面之外，还帮着收集资料，念材料，录磁带等等。每天傍晚总可以在校园里看到导师会挽着郑先生散步，边走边聊学术问题，这个情景时间长了，成了厦大美丽校园的一道风景线。我经常可以听到熟悉他们家庭的老师们，甚至于我素不相识的过路人对他们夫妻恩爱的啧啧评价。1988年下半年，我因准备毕业论文赴外地查阅资料，拜访业内权威学者，不曾想到北京、上海的同行学者对导师一家的情况也是异常的了解，言导师一家的经历是坎坷的，这一生走过来是不容易的，导师对丈夫、对家庭付出了太多太多，并嘱咐我一定要把他们的问候带到。我始知导师的慈母声名不仅仅在厦大校园，早已名声在外。我在默默汲取导师学识涵养的同时，也时刻分享着他们的家庭温暖，每当我休假回校，导师第一件事就会问起我的家庭情况，了解家乡的变化，询问我的见闻感受，足见她虽不常离开家园，但心中永远装着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无比关切之心。每个学期，遇到重大节日，我们几位弟子（包括郑先生的研究生）都会被邀到家里吃饭，享受一家子的和谐快乐以及那爱生如子的情怀。

得益于郑道传先生的支持推荐，我毕业之后来到现在的工作单位报到工作，期间因工作关系，我有较多的机会还能继续进入我那个熟悉的家门，与两位先生聊天说事谈心，感受好似还没有离开温馨的校园和可敬的导师。承蒙两位先生对我工作上的继续谆谆教诲，引导我在工作岗位上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顺利成长。



陈兆璋协助郑道传备课

写于二〇一〇年十月



## (5) 我的父亲和母亲

郑启平

像一个蒙着双眼的超长距离的越野运动员，父亲经过了五十年的奔跑，翻过一座座崇山峻岭，越过一条条激流险滩，冲过了一场场暴风骤雨，攀越了形形色色的拦阻与障碍，父亲终于在他八十岁高龄的时候，拖着羸弱之躯，在奄奄一息之中抵达了自己心中的圣殿……不幸的父亲啊万幸的父亲！月圆月缺，这是一个人生追求的奇迹；幕落幕起，这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悲喜剧！

我的妈妈，自从1948年与父亲结婚，直到2002年父亲离开人世的54年漫长岁月中，无论是风和日丽的黎明，还是暴风骤雨的黑夜，特别是在极左路线肆虐的二十多年中，妈妈总是坚决地拒绝和愤怒地抵制了某些人一次次：“陈兆璋必须和郑道传划清界限”的喧嚣。作为一位在史学上有所建树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位贤妻良母，她克服了常人难以相像的痛楚和压力，始终忠心耿耿地陪伴着父亲，她用毕生的心血和感情，拖着羸弱的身躯，却又带着必胜的信念，带领着我们全家，倾尽全部心力，呵护和照料着父亲。

父亲惊人业绩的背后，是母亲巨大的付出。母亲在自己教学和科研之余，还尽全力帮双目失明的丈夫收集资料，做简报，念教材。晚上父亲躺在床上，想起明天讲课内容还有不成熟的地方，母亲就要马上打开书本，帮他需要的那段文字，然后再念给他听……父亲母亲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谱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夫妻坎坷而凄美的华章。

(作者为郑道传\陈兆璋教授的大儿子,厦门第一中学教师)





## (6) 王亚南的贺礼

郑启五

我家藏有一部王亚南（1901—1969）先生的赠书——《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1948年10月的首版，在书的扉页有作者亲笔题签：“以此书祝贺并纪念道传学弟结婚之喜，亚南1949年1月31日”，这是我家的传家宝。

王亚南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资本论》的翻译者、厦门大学的老校长。家父郑道传（1919—2002）在厦大求学时是王亚南教授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又先后随王亚南到福建省研究院和厦门大学从事科研与教学，直至终了。他结婚时身为恩师的王亚南先生的贺礼就是一部书，一部刚刚出版的还散发着墨香的书。这对一个前行中的青年学者是何等的鼓励，此刻我仿佛能感受到家父在接到这特殊的贺礼时起伏的心潮……

学生结婚了，就送上一部自己刚出版的新书作为贺礼，竟不知不觉成为了我们这个教师家庭的传统：半个世纪来家父和家母始终都是这么效仿的，二十多年来哥哥和我也是这么悄然沿袭的，也许书的分量无法同日而语，但老师对学生期许和祝福的目光却是同样的清澈与热切……

（作者为郑道传\陈兆璋教授的二儿子、我校人口研究所研究生导师）



王亚南的签赠



王亚南的赠书



## (7) 陈兆璋老师的一封信

郑启五

我的母亲陈兆璋(1924-2010)生前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的教师，我在处理她老人家的遗物时发现了几捆旧纸，本来已经准备作为废纸处理，后来多动了一下心眼，发现是长年积存的信札，于是就保留了其中的一捆作为纪念。今年寒假抽空，把这些旧纸翻了一下，才发现里面不乏我国教育界知名教授和学者的真迹，也有她的厦大1942级同学会的海内外来函，更有她学生的来信，包括她满天下的桃李，以及素不相识而慕名写来的求助信，远去的书信，永远的书香，我越读越感慨，最终免不了热泪盈眶，母亲是教师，我也是教师，我们都热爱自己的职业，也热爱自己的学生，但相比之下，我与母亲有不小的距离，师德、师德，今不如昔，这或许是时代变迁的一个无可奈何的缩影……

母亲保存了在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那么多来信，却唯独没有她自己的复信，这是书信这一通讯形式的结果，但也是作为继承这些旧信的儿子不小的遗憾。也许真的是老天有眼，日前居然让我十分偶然地在母亲的一本教案中发现了一封她给学生的复信，这封信为什么忘了寄出，还是寄出了又被退回，就不得而知了，母亲一生心细，被退回的可能性更大，依稀记得母亲曾抱怨过学生的地址写得不够周详。

从信文判断，这位“进福同学”应该不是厦大的学生，大概是读了母亲的史论后来函讨教的外校学子，母亲曾参与由教育部主持编写高校历史专业教材《世界史·中世纪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后多次再版），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和江苏省社科院《江河学刊》发表多篇关于“十字军东侵”和“拜占庭帝国”的学术论文。

母亲在复信里赞叹了该生“独立思考的精神”，谈了她对十字军东侵“宗教说”的看法，并质疑“如主要是为了‘宗教’，那又如何解释第四次东侵对拜占庭帝国的掠夺和侵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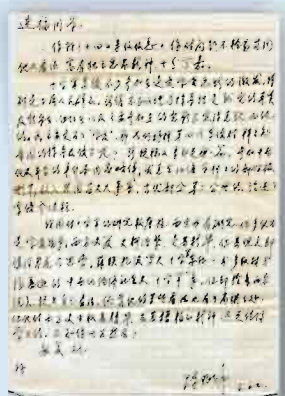
母亲的复信在最后一段提出了她对东西方史学的整体见解：“我国对十字军的研究较薄弱，西方多有研究，但多认为是宗教战争。西方史籍、史料浩繁，是其精华，但其观点却值得考虑和思索。苏联扎波罗夫《十字军东征》一书多取材于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十字军’章，但却舍弃西方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尽管他的某些看法也有可商榷之处，但他对西方史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不知你以为然否？”

信的落款只有6月22日却没有年份，估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个动荡的日月，母亲对我多有唠叨，我知道母亲疼我，但我却极为反叛我行我素，从不把母亲的学术研究放在眼里，直到2008年我离开母亲远赴土耳其孔子学院任职时站在伊斯坦布尔的古堡和古城墙上，才得知这里居然是当年“十字军”最主要的战场，是“拜占庭帝国的首府”，是母亲一辈子学术研究的地盘，不由对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仰天长叹，难道我是替一辈子走不出国门的母亲来抚摸那斑驳的古堡？

母亲那一代老知识分子，曾在封闭的中国大陆研究世界史，该有多么不容易，更有接二连三的政治磨难劈头盖脑，但无论风雨飘摇还是阳光明媚，母亲总是兢兢业业，更以一个女教授非凡的人格和爱心敬忠职守，忍辱负重。在整理旧信时我读到一位名叫张俊融的在台学生，年近八旬从台北来信写道“陈老师：……祝您日常无忧无虑，身心常保健康，别忘了台北市还有一位您从小疼爱的学生，该轮到替他替您分忧解劳，请您有事不必客气尽管吩咐……”母亲一位半个世纪多前的学生都对她保留了那么完美的印象，这就是传说中的“爱生如子”？

从母亲默默保藏的大量学生来信中，足见母亲的爱生如子，但我不妒忌，我知道母亲一生爱生如子，但她最爱的还是她的儿子，我只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她在奄奄一息时叮嘱我坚守土耳其孔子学院的工作岗位，自己却悄然撒手西去，此时此刻对着母亲的遗像和信件，“妈——，请允许我第一次喊您一声‘陈兆璋老师’！”

2012/3/6



陈兆璋教授亲笔信



郑道传陈兆璋1998年在厦门大学

主编：郑启五

策划：萧德洪

陈小慧

刘心舜



地址：厦门市思明南路422号

邮编：361005

电话：0592-2188287

<http://library.xmu.edu.cn>

展览地点：厦门大学图书馆厦大文库